



上海旧影

十里洋场

汤伟康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目 录

“十里洋场”的由来.....	1
上海租界一号“道契”.....	4
黄浦江畔洋行多.....	7
上海的华尔街.....	11
“铁路时代”的起点.....	15
“标贴一分千里寄”.....	19
从无线电报到电话.....	23
从煤气灯到电光灯.....	27
话说自来水.....	30
三“局”管辖的公交车.....	33
马路如虎口.....	37
外白渡桥.....	41
租界内的卫生防疫.....	45
传教士.....	49
教会学校.....	53
西方娱乐生活的演化.....	57
新剧、文明戏、话剧.....	61
影院春秋.....	64
最早的商品展销.....	67
街头露天职业.....	69
街头骗局.....	73
“关店大拍卖”内幕.....	75
小菜场溯源.....	77
老虎灶.....	79

大都市的“生命容器”	80
“高等华人”	84
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上海人	87

“十里洋场”的由来

畸形发展的旧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其实，十里洋场的形成，当时是仅指租界而言，以后，人们叫顺了嘴，就成为旧上海的泛称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宣布开埠，外国商人冒险家纷至沓来。他们从贩运鸦片起家，在外滩一带兴建洋楼，开设洋行，逐渐成为上海港的新的主宰，并在这里划定了租界。如果把最早在上海设立的英法两个租界加起来，按其长度计算，大约正好是十里。“十里洋场”的名称，正是从这时候叫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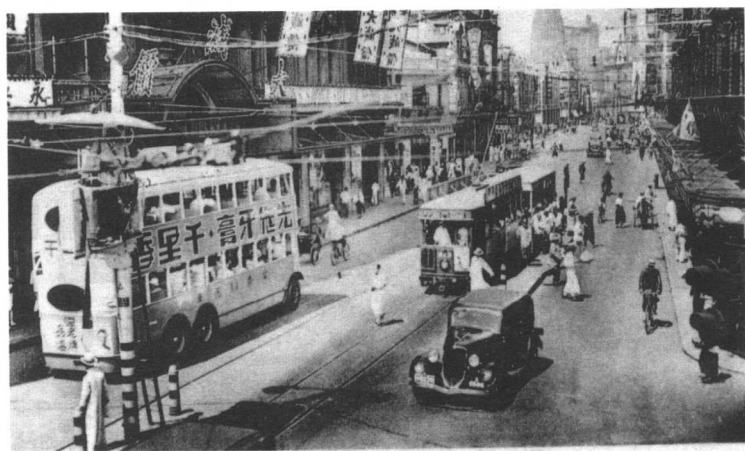
以租界为标志的十里洋场逐渐得到了繁荣和发展，进而使上海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活动的中心。殖民主义者先后修筑了跑马厅，开辟了南京路。他们还在这里开设银行、兴建大厦，大搞地产投机活动，垄断中国金融财政。为了宣扬“西方文明”，十里洋场里还出现了包括新闻、出版、电影、文化的许多机构，甚至舞厅、夜总会、妓院等。这一切，都给十里洋场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终于成为旧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代名词了。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



40年代外滩



2 30年代南京路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廨在审讯中国人犯



郭士立, 19世纪30年代即来
上海窥探情报的普鲁士人

上海租界一号“道契”

本文所说“道契”，就是一张出租土地的契约。地皮原址即今中山东一路18号，面积为13亩8分9厘4毫，因为有清朝道台的钤印，故称“道契”。它的产生，和以后上海出现的租界紧密相关。

鸦片战争后，清朝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同意开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率兵船一艘、商船六艘驶抵吴淞口，次日登岸谒见道台宫慕久，随即在城内东西大街新街巷租房52间作为领事公署和住宅，11月14日张贴布告一张，称：“上海将于17日正式开为商埠，所有条约规定各项，均于该日内发生效力。”英国殖民者终于撬开了上海的大门。

上海开埠之初，散居在城内的英人仅25人，但不久，大批商人、冒险家接踵而至，为商人租地造屋事，英方多次交涉，于是遂有《上海地皮章程》产生。第一次地皮章程于1845年11月29日公布，划定洋泾浜（1914年已填，现为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现为北京东路）以南的土地，作为英国商人

租住居留之地域。其走向大致是从现在的中汇大楼沿延安东路东至外滩，再折北沿黄浦江至北京东路，复折向西至河南中路，这一块长方形的地区，占地面积约830亩，由此形成上海第一块租界。

英商租地须与原业主双方立契，送上海道台审查钤印，表示土地所有权尚属中国所有。但事实上，这个所有权是虚伪的。上述“道契”上有这些字样：“……今据英商颠地·兰士禄遵照和约，禀明在上海港口所定英人租地造屋。居住界内，欲将原业户奚尚德等地基一处永远租赁……倘若英商颠地·兰士禄愿将退地，由该业户奚尚德等即必收回……但概不准该业户奚尚德自讨退地……”道契是依照固定契式书立的，内中的“不准该业户”、“自讨退地”，表明了租地是永租性质的，并有“永远租赁”字样。而且，按照该地皮章程，承租人可以将租地“全部让与他人”，“或以一部转租他人”，原业户是不得自讨退地的。事实上，上述一号道契所含土地已经多次转让，以后也非颠地所有。后来，上海地皮价格暴涨，土地变成地产商的发财筹码，原业户始终无权支配，所以，租地

“道契”实质上起了卖地的作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贪婪本性，清朝统治者的昏聩、腐败和无能，给上海人民上了深刻的一课。

上海第一号“道契”的英国执契人颠地·兰士禄是个大鸦片商，一直在广州走私鸦片。1844年4月，亦即上海开埠后半年，他转来上海，当年就选中这块地，盖起了宝顺洋行，继续干着贩卖鸦片的勾当。包括颠地在内的鸦片走私贩们，刚来上海时，在财力上多是捉襟见肘的，但随着鸦片走私量的骤增，那些初来上海时不名一文，有的甚至是本国亡命之徒的洋行创办人，竟个个腰缠万贯，成了贵显权要，作为权利和财富象征的建筑，在外滩鳞次栉比地扩建和翻造。到20世纪20年代，大致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外滩建筑群。

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以

这一块830亩租地为满足，1848年就扩展到2820亩。美、法也步英国后尘，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五国通商中的权利，许其居住贸易。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以传教为名，在虹口一带占据地盘。他于1848年向道台提出要求，1863年美租界划定为5200亩（后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交涉，最初划定986亩为法租界。随着以后不断扩张，到1919年，上海英、美、法租界面积竟达48650亩，这还不包括他们修建在租界外面的马路，即“越界筑路”区域。

殖民主义者利用租界，在上海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国中之国”，给上海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时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把上海租界主权彻底收回。

上海开埠初期，外国洋行大都在黄浦江西岸设立行址，各洋行如怡和、旗昌、宝顺等，也是在自己行址门前建筑码头，都没有越出居留地界址。

1860年以后，各洋行为航运业的厚利所吸引，纷纷订制火轮船，原有的驳船驳运已不适应日趋增多的货物上下需要，改为火轮船直接停靠岸边装卸货物。原有的小型驳船码头也大事改造，改为“用大木植桩，贯穿铁条，排列十余里，广数丈”的成片的大码头，其码头恰与轮船相当，可用马车经运货物至轮船，无须驳船。并于江岸涨滩填造地基，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囤货栈房。同时，更向水域伸展，侵占江面水域都在100英尺以上。当时的上海道台，以新建码头侵入江面危害航道安全为由，照会三国领事将“违章”建造的码头拆除。所得到的答复是，既成事实，不得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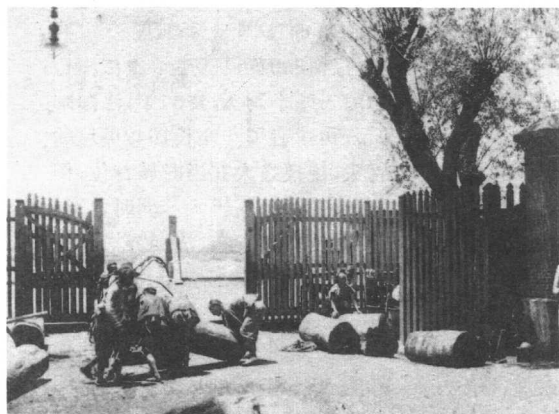
想做“世界的主人”的英国人，在上海建立居留地立稳脚跟之后，是以上海作基地，以“开放整个中国”为目标的。他们还要扩张，不仅向浦西的界外江岸扩张，更把视野扩展至浦东。于是，英、美、法三国围绕着抢占沿江有利

地段的争夺战，在浦东、浦西激烈地展开了。

后来居上的鸦片大王沙逊来到上海时，英居留地内的江岸早已为先到的洋行占去了，连法租界地皮的分配也已经结束。1854年，他在阿礼国支持下，私自就法租界外滩一块地皮与中国业主进行议价定价活动，企图在法商雷米之前，先把购地手续办好。法领事爱棠为了保护法国在中国这一块地方所占有的利益，态度坚决，毫不相让。1861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已有不下16艘汽船，从事沿海沿江贸易，它在法租界外滩购定的两段地皮上树立界石，准备起造码头。法领事即派巡捕将界石搬掉，引起美、法两领事之间的一场交涉。最后，将该地皮交由尚未到来的法国皇家邮船公司购去，仅留300英尺江岸给旗昌洋行建造一座小码头。1864年，法国邮船公司建造了一座长1649英尺的码头，规模之大在当时属首位，俗称“法兰西公司码头”。同时，1864年4月法领事宣布，法租界沿江地产是属“公家的”，禁止业主建造房子，只有法公董局有权出资在该地设置码头，并要把属于其他外国人已建的码头买下来，企图



黄浦江畔密集的码头。摄于20年代



码头工人在从事繁重的搬运

桐油出口



草帽出口



茶叶出口



独占法界沿江地段。1873年10月，英太古洋行要在自己地产对面的江岸上建造一座最新式的、用支柱架空带屋顶的码头。旗昌洋行大班瓦赞适任法界公董局总董，借助法领事势力，立即采取各种措施，阻止正在进行中的码头工程。为了与航运业中的劲敌竞争，美、法两个“弱者”联手对付一个缓起的“强者”，在法租界江岸上揭开了争夺有利地段的激战。与此同时，他们还把覬覦目标对准了黄浦江东岸的领土。早在1853年，英国洋行就插手浦东，建立了一个董家渡船坞。怡和洋行起初是向虹口苏州河北的江岸伸展，在这里据有顺泰、琼记和滔律文等几座码头。建立华海轮船公司之后，1875年吞并复升洋行的公和祥码头，成立了专营码头业务的公和祥码头公司。控制和垄断当时整个上海的码头业务。随后，公和祥码头公司便向浦东进军，1891年买进浦东英国海军码头，强占民田，扩建为其昌东西栈码头。太古洋行在浦东建有华通码头和浦东栈码头。还有一个英国洋行，在浦东陆家嘴围垫涨滩50亩，滩地伸出江面300英尺，建起

一座长171英尺的码头……以建造码头开路，随后，其他国家许多工厂、火油栈库也陆续选中浦东沿江地段建立起来。浦东江岸跟在浦西之后，已被外国资本利用和开发，实现了实际上的占有。既成事实之后，1895年起，工部局便把浦东列为扩充租界面积的组成部分，将浦东新扩地区绘成地图，致函领袖总董，指出浦东方面的情形是“码头、油栈以及其他关于造船工业之迅疾发展，最堪注意”，“非得划入工部局征税管理范围以内，即无一得享卫生、警卫或路灯之利”，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交涉。而法领事亦不甘落后，闻讯立即提出将法租界对岸之浦东部分地段划入法租界管辖范围之内，矛盾激化相持不下。1899年3月，中日战争爆发，英、美、法三国联合对付清政府，强令两江总督应允工部局所求之扩充，并将“对租界扩充态度强硬不协”之上海道台蔡钧撤换，新订扩充租界界址。其中，虽未将浦东划入，而浦东已成事实上的租界界地，黄浦江东东西两岸的堆栈码头，尽是洋行天下了。

美国纽约有一条华尔街，以美国金融中心而享盛誉。上海开埠不久，第一家以银行见称的外国金融机构——英国丽如银行，于1848年在黄浦滩路11号设分行，挂起开业招牌（后称东方银行）。1854年印度伦敦中国商业行在上海设代理处（即1857年的有利银行分行，九江路2号），英国阿加刺银行设分行于九江路1号，1855年英国汇隆银行在上海设代理处（江西路27号），1857年英国麦加利银行在上海设分行（江西路10号）。随后，利中银行（四川路14号）、利商银行（黄浦滩路2号）、汇泉银行（福州路17号）、法兰西银行（南京路6号）以及汇丰银行（初名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也在上海设立分行。英租界的黄浦滩路附近，形成了一个外国银行麇集区，上海的“华尔街”。

但是上海开埠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建立的银行分行，并不具备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性质，都是为适应进出口鸦片和丝茶贸易扩大的需要而设的，基本上仍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性质。号称上海最早的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虽然“很快做了不少生意”，但仍只不过是

一个“国外汇票的经纪人”。

19世纪70年代之后，外国商品大量在中国倾销，进入商品输出阶段，西方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这个时期，为了与列强对华领土侵略转向经济渗透的趋势相适应，在上海租界内，英、法、德、日、俄等国先后建立起银行。1890年德国的德华银行在上海开办，行址设在黄浦滩路14号；1893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黄浦滩路31号设址；1896年俄国俄华道胜银行（主要股东是法金融资本家）设在黄浦滩路15号；1899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设在黄浦滩路29号；日本台湾银行设在黄浦滩路16号；1902年比利时华比银行设在黄浦滩路20号；美国花旗银行设在九江路A字1号；1903年荷兰银行设在黄浦滩路21号。这样，黄浦滩路一带形成了一个外国银行集中区，这些银行执行资本输出的职能，在中国发行钞票，经营中国的借款和赔款，不仅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并且通过操纵中国的金融和向清政府贷款，控制中国的政治大权，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金融工具。如此，黄浦滩路，真正成了上海的“华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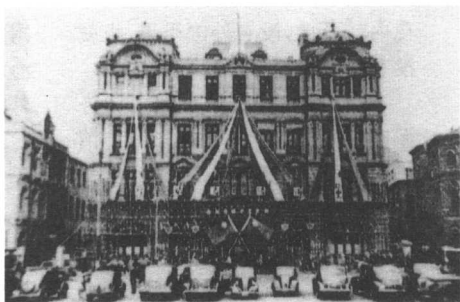


建立在外滩的横滨正金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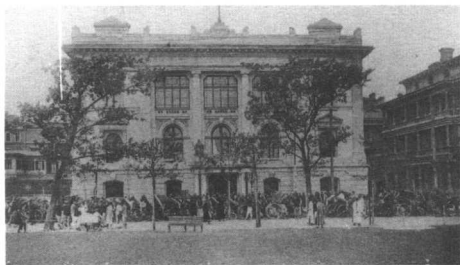


近代上海金融机构的集中地

中国人兴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街”，它与美国纽约华尔街不同的只是这一金融中心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

1904年，美国政府任命的一个国际汇兑调查委员会就曾坦率地指出，这批外国银行在上海租界里开业，是凭借特权非法地活动：“这些银行在中国营业并未和中国政府订立契约，中国政府并不曾发特许状，它们仅仅是在中国人隐忍之下进行的……它们受到列强势力的保护，享受租界以内的外国财产所有者及外国商人的特权，自然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可见，没有外国租界，也就没有外国银行立足地。

晚至1897年，才出现由洋务派盛宣怀发起创办的第一家中国

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行址也设在黄浦滩路7号。它聘请英人为大班，主要业务为吸收存款，对工厂企业放款和发行钞票。随后，1905年户部银行也在黄浦滩路23号设分行(辛亥革命后改名中国银行)，再后，信成、信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交通、裕通、浙江银行等华人办的银行相继建立，除信成银行设在南市大东门外，其他也都设在“华尔街”的金融区内。它们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崛起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大进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上海的“华尔街”已不再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了。